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商业造城

Based on Commercial Space

杨之懿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商业造城

Based on Commercial Space

杨之懿 编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业造城 / 杨之懿编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8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 杨之懿主编)
ISBN 978-7-5608-4587-6

I. ①商… II. ①杨… III. ①城市建设-研究-上海
市 IV. ①F29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7399号

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

商业造城

杨之懿 编著

责任编辑 宋磊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mm x 1092mm 1/16

印 张 16

印 数 1-3100

字 数 399 000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587-6

定 价 4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信念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摩登（现代）不仅关乎某种历史时尚，而是始终值得思索的问题，对于仍处在高速发展和变化动荡中的中国城市与建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既不能无视现代化过程已经造成的种种影响，也不能武断地下结论现代化程已经结束。作为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摩登联系着更为漫长甚至顽固的前现代和既不知所云又不关心走向的后现代。令人啼笑皆非的无奈事实是，发生在中国建筑环境内的种种现象证明，这三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时期正同时混杂地运行在我们周围。或者，体系完整的现代性在中国始终是挣扎前行的未完成。重新认识和理解摩登，（根据当下情况）或者称其为“非典型摩登”，可能是提示我们把握和定位目前建筑学身份和发展水平至关重要的钥匙。

也许真正原创的摩登确实并非基于东方文化，我们做的工作一直是参悟并消化其精神，将其转译到自身文脉中去。但这并非是“无奈”的被动思考。因为摩登既指某种特定的风格形式，又指文明转变的内在关系，既呈现为过程，也代表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终点”（福科，Michel Foucault）。如果摩登最终真的是一种信念，那对于东西方来说都一样公平。

前言

《商业造城》是“非典型摩登城市系列”丛书的分题研究之一。丛书希望通过城市建筑一些特定的角度来审视“上海式”都市进化和建筑演变所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筑学可能发展的“城市性”特征，讨论形式形成的基础和走向，以及与西方的差异，寻找现象发展背后的动机与推动力，思考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批判“中国特色”——某种妖魔化的自闭论调，或者“全球一面”——简单的亦步亦趋论调。

本书分研究和设计两个板块展开，第一板块以论文图表为主。依托类型和历史的调研，围绕发展线索和影响因素，分析一些重要的商业样态是如何演变发展，在城市建设中到底起到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希望能够串接起各商业类型在各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典型形态，理解它们在原型的基础上继承与变异的推动因素。第二板块以“虚拟”项目的方式进行。虽然与设计相关，就研究的本意而言，并不希望产生因设计带来的形式困扰，所以尽可能选择简单直接的操作，务求“一眼即明”的针对性。目的是借助建筑实体印象，整理和展现第一板块研究的各个侧面，以及在具体城市环境中的场所倾向。

本书的参编人员如下：钱星羽、田园、徐丹、章莹莹、张鑫、祝博、蒋昱、叶贞祯、王浩、马学鑫。客座支持：冯国安（香港建筑中心总监，傲思建筑设计主持）。特别感谢：孙哲先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撰稿“中国城市商业样态的传统性因素”。宋磊先生（同济大学出版社），给予本书内容策划方面的建议。

目录

序

前 言

上 篇 上海城市商业样态的类型研究	1
中国城市商业样态的传统性因素	2
上海城市商业说明	21
都市乐园	43
高城市	75
轨道交通与商业	115
上海商业绅士化图说	135
销品茂	155
下 篇 场所与设计讨论	189
中心广场	190
零售街区	197
步行街	206
轨道交通站点	213
市场综合体	221
附 录	229
上海商业与城市建设大事记	230
世界城市肌理比较	238

中国城市商业样态的传统性因素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城市的商业样态常常有一种“地狱般的绚烂”。客观地看，这种“绚烂”的景象，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城市商业活动中过于强旺的“世俗性”通过现代转型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中国现代城市商业闹市区中的延续性反应。



中国城市商业样态的传统性因素

一、《攻壳机动队》与“中国式”的城市商样业态

《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是一部很经典的动画电影，导演押井守在电影中展示出对城市景观的独到匠心。比如说，故事发生的舞台被设置在未来的香港，当情节发展到中途时，配合着奇幻色彩的主题音乐，导演特意安排了一段描绘未来香港城市面貌的纯画面桥段：彼时的香港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都会，但并不是一般科幻作品中那种超现实的冰冷整洁的未来都市，而是带有一种各类生活痕迹经年累月层叠积淀的历史沧桑感。阴霾的天空，凌乱的凄雨，森林般的玻璃钢筋混凝土摩天楼群尺度巨大、姿态冷酷，大街小巷到处是各色中文繁体字的霓虹牌匾和灯箱，随处可见破旧斑驳的广告招贴和褪为暗红色的中式楹联福字年画，渺小的行人和车辆穿梭往来、行色匆匆……整个城市笼罩于一种气氛之下，默然而诡谲。

相信押井守对香港特殊的城市风情有着深切的感受，他悉心描绘出的这些场景在今天的香港都可以找到真实原型，尤其是在中心闹市区，那里的城市空间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各种带有商业信息的符号（尤其是本身具有历史感的中式传统符号）以及长期商业活动所沉积下来的斑驳痕迹充满了视野，包裹着建筑物的原本外形。在香港，商业已经成为塑造城市空间外形和气氛的主要因素。无独有偶，同样是商业发达的城市，上海很多闹市区的街道上也有相似的景象。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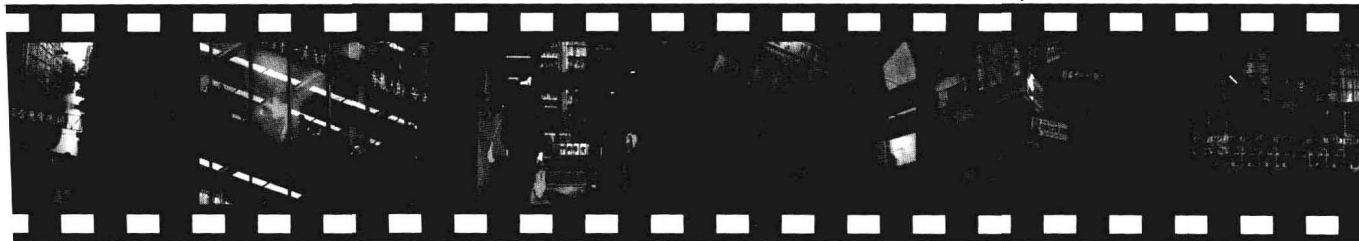




香港铜锣湾商业街景部分

市，天津、广州、青岛、成都，等等，它们的商业空间也是如此：整个闹市区规模巨大、功能混杂、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喧嚣纷乱；街道上是一间紧挨一间的店铺，经营的内容五花八门；沿街建筑立面挂满了横横竖竖的招牌灯箱、霓虹灯，五颜六色，变幻闪烁……甚至在海外城市中华人聚居的唐人街(Chinatown)也是如此。总的来说，中国城市（或中国人聚居区）中的商业闹市往往是一个繁华张扬并且凌乱混杂的综合体，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地狱般的绚烂”。

“地狱般的绚烂”，这是某欧洲建筑师对中国城市商业样态的一句观感，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意识。如果除去意识形态的成分，从正





上海南京东路商业街景



天津滨江道商业街景



广州上下九路商业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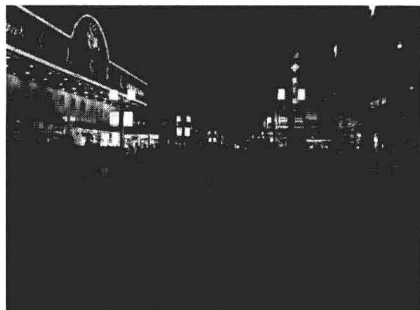
成都春熙路商业街景



北京王府井商业街景



北京西单商业街景



苏州观前街商业街景



海外唐人街商业街景



面去理解其含义，也许能够为我们认识自己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到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点就是，所谓建筑学的学科核心，实际上就是西方建筑学的传统。虽然有过从“建筑之树”到“文明之河”的宏观讨论，但在面对每一项具体的设计和研究工作时，我们都不得不参照西方建筑学的发展脉络。从西方城市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东亚）的城市商业无论内涵功能还是外在形态，的确显得缺少秩序和逻辑。过于繁华张扬的外在形态（哪怕仍处于发展中状态，并未最终成形）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中国式”的“风情”。这种“中国式”在西方人眼中多少有点“他者”的味道，其结果就是使中国的城市商业样态在意象上具有一种被消费的可能，从而丧失了对其空间本质进行正面批评建设的潜在机会。实际上，中国（远东）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是一个历史客观，“中国式”在西方审美习惯中一直有种区别于西方传统古典趣味的另类美感。现在中国城市商业样态的这种“中国式”，实际上是这种另类美感的延续，结合了现代审美中的很多非古典的“变态”趣味，演变为一种新的带有“变态”意味的美感。“地狱”一词充分体现了这种意味。《攻壳机动队》中的那个纯画面桥段就是把这种美感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从而成为经典——押井守所描绘的未来香港实际上是他自己（作为西化了的日本人）眼中的一个“他者”，一个繁华并混乱着的“中国式”商业城市。

二、《清明上河图》与中国城市的传统商业样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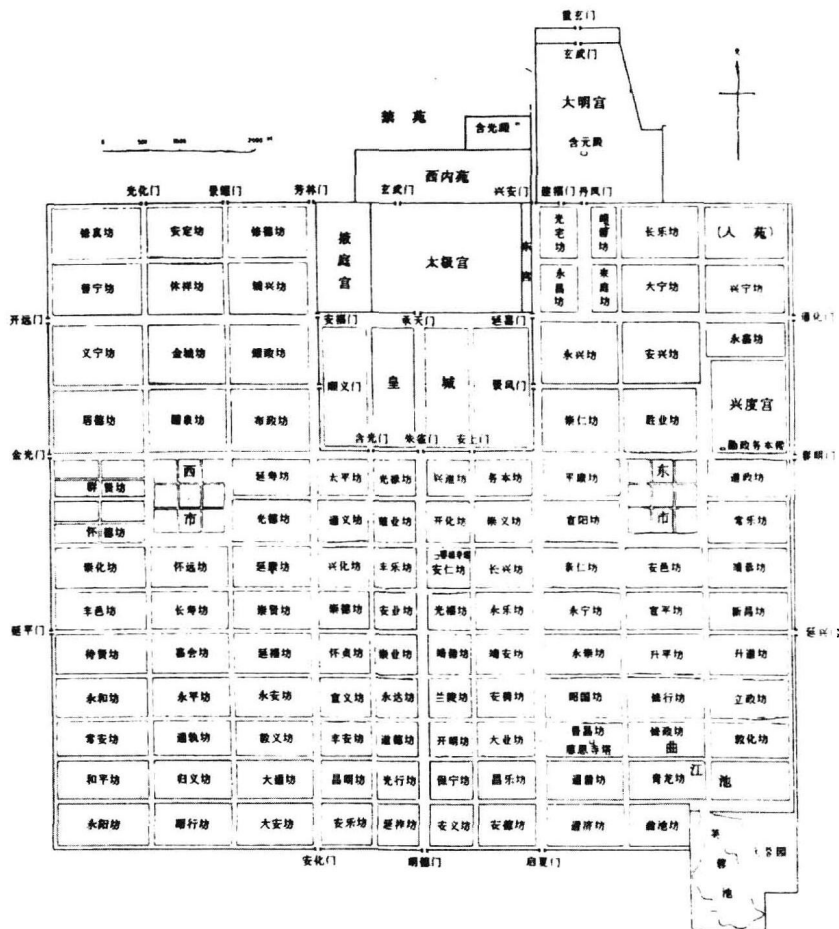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中国自身。摆脱“他者”阴影，客观地看待这种现象，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为何所有的中国城市商业样态都是如此的相似？这种“绚烂”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内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这些相似现象的背后是否有着共同的“遗传基因”？要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回溯一下中国传统城市商业样态的发展轨迹。



中国城市中商业闹市区成为市民的日常公共活动场所是从北宋开始，与北宋时期的所谓“城市革命”有直接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由唐到宋实际上发生了一次比较深刻的社会转型。唐以前的中国基本是一种由贵族门阀或军人统治的比较严格的封建等级社会，城市规划设计贯彻的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比如唐长安，基本是三种形成因素：①《周礼·考工记》里的都城理想，涉及一些特别中国传统的宇宙观；②由“井田制”而来的方形构图原则；③上中古封建等级社会体制下的“城池—村落”同构性结构（传统中国城市和村落在型制上是一样的，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在一个城市里，城市和城市中的里坊也基本同构）。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按照“规范”建设起来的城市，一种意识形态在物质空间层面的直接转译，形成机制也比较单纯直接，没有更多的异质因素。从现代建筑学的角度看，唐长安的形成机制并不是建立在一种由各类客观因素相互发生作用而形成的逻辑之上的（包括对人的关注）。

唐长安是中世纪时旧大陆上的“国际大都市”，繁盛一时，但这种繁盛仍是一种官方政治性的而非市民商业性的。包括唐以前的城市，对社会底层的老百姓都没有考虑，庶民基本上没有公共集会场所，都被圈在里坊里。长安城中用作商业活动的东、西两市，每日开市闭市均有严格时间限制，很制度化。也有一些娱乐场所，酒楼欢场之类，但都是在各个“坊”中，与城市街道的公共空间没有直接联系。

玄宗以后唐朝开始衰落，又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当时中国社会的贵族门阀制度受到很大冲击。到了北宋，一方面贵族阶层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的兴起，城市里新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市民阶层”。同时，科举制导致了社会下层可以通过考试向上迁升，因此北宋基本是一个平民文官的政治制度。这造成的变化就是社会下层可以把很多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带到统治阶层内部，从而整个社会的风尚从官方开始转变。宋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很世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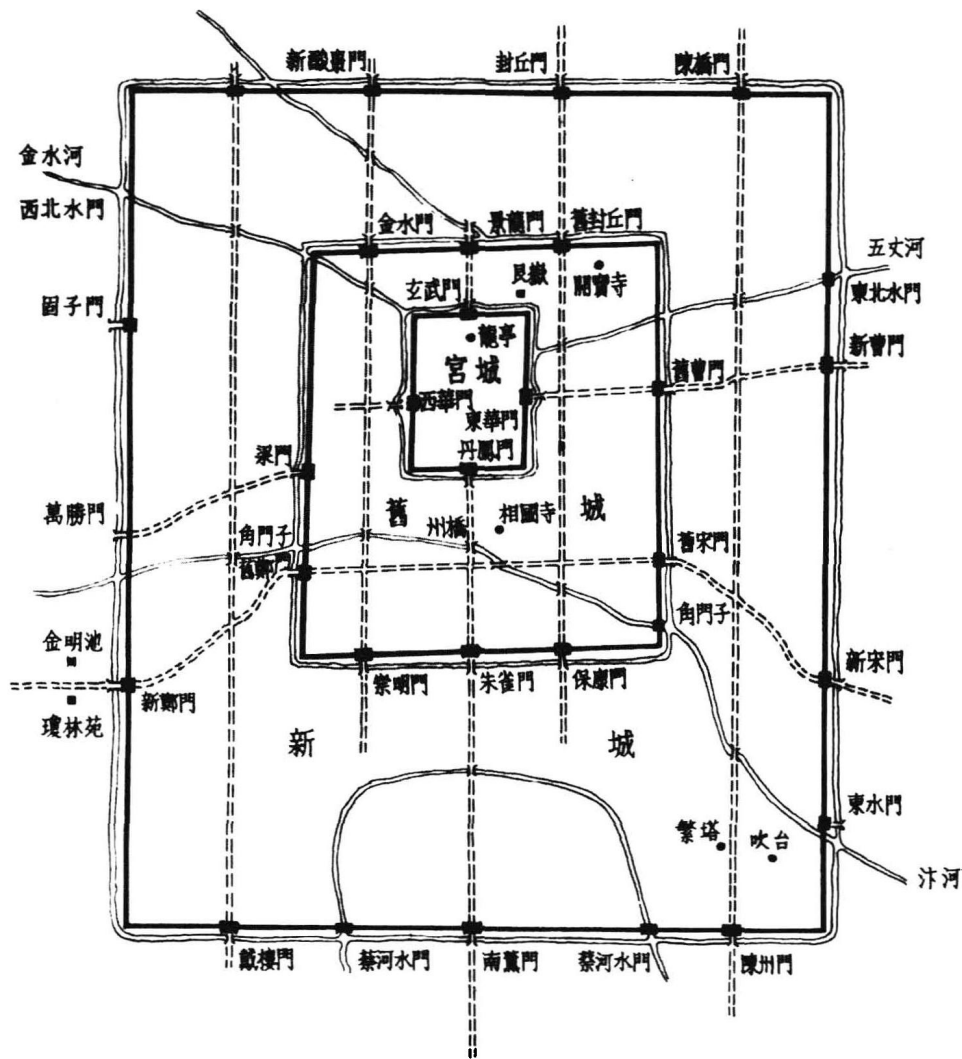


唐长安城复原图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商业。自宋代起，商业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国际史学界目前已认可的一个命题是，宋代的中国社会以从东京（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等大城市为中心，发生过一场所谓的“商业革命”，其对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堪比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对近现代社会以及20世纪下半叶美国信息革命对当代社会的贡献。宋代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有了巨大进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之得到积累，这些因素为工商业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当时的商业已经远远超越了“剩余产品交换”的简单状态，成为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和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力量。“交子”的出现等等现象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商业繁荣的例证。另外，宋代的科学技术在工商业的刺激下有了长足的进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宋开封城市平面